

人文  
学术 张 辉 宋炳辉 主编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

程 巍 著

# 文学的政治底稿： 英美文学史论集

The Political Underpainting: Essays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

復旦大學出版社

程 巍 著

# 文学的政治底稿： 英美文学史论集

The Political Underpainting Essays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政治底稿:英美文学史论集/程巍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10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张辉,宋炳辉主编)

ISBN 978-7-309-10837-8

I. 文… II. 程… III. ①英国文学-文学史-文集②文学史-美国-文集  
IV. ①I561.09-53②I71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8917 号

文学的政治底稿:英美文学史论集

程 巍 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春秋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 字数 252 千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837-8/I · 853

定价: 38.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总序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终于将陆续与读者见面。从动议编辑这套文库到如今变成现实，其中真是颇多可感怀之处。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是“中生代”比较文学学人一次小小的集结；“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我们献给自己师长们一份迟交的作业；“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又是我们给各位同仁，乃至更年轻同行们发出的对话与批评的邀请。

多年的酝酿筹划、多年的协同努力，使我们逐步将自己的工作与更深远而广大的时间和空间背景联系了起来，并开始慢慢融入其中。作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受系统学术训练的“新一代”比较文学学人，我们深深知道，自己的每一点成长与进步，都无不受益于祖国的开放改革，受惠于师长们的谆谆教诲，受惠于同辈间的切磋琢磨。我们是这十五年、三十年乃至更长时段文化积淀的受益者，也是一批如饥似渴的学习者和无比幸运的历史见证者。我们也许注定是行色匆匆的“过客”，但我们却也应是承先启后的“桥梁”，必须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而这里记录的正是我们探索行进的脚印，也是我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一点微末的贡献。

百年中国文学“走向(进)世界”的历程，给了我们思考过去、筹划未来的“底气”；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与发展，为我们准备了难能可贵的学术资源和不可或缺的学科建制。我们将这套丛书命名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以之与我们所属的学科名称相呼应，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打破界限，超越学科、语言与文化的限制，乃是我们比较文学学人的使命乃至宿命。是的，我们无疑拥有不同的学术爱好、志趣和观点，但至少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把我们联

系在了一起——那就是，我们必须在世界的语境中，以比较的眼光，从多学科的视域，面对并尝试回答我们所浸润其中的文学与文化问题。

“德不孤，必有邻。”非常幸运的是，我们身处富于活力和学术追求的知识与精神共同体之中。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许多老师和朋友的无私帮助；也得到了具有远见卓识的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们要送上我们衷心的谢意。

同样值得高兴的是，与这套“文库”相呼应，《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辑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讲座系列”等姊妹项目也已次第启动。

在“文库”陆续面世的这个特殊时刻，先贤们的声音似乎又一次在我们的耳畔响起。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的发展应“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而陈寅恪先生则说，华夏文化的崛起须“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出，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响应先贤的号召，集结这套文库，仅是我们的一种尝试。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取今复古”、“扩大恢张”的行列中，贡献他们的智慧与力量；希望我们会有继续编辑以后各辑的荣幸。

是所望也，谨为序。

编 者

2013年5月初稿

2014年4月修订

# 自序

收于本集子的是十二篇有关英美文学—文化史和理论方面的论文，其中最早发表的《纨绔子的两重性——析艾伦·摩尔斯〈纨绔子〉》，兼谈反资产阶级意识的起源》与最近发表的《反浪漫主义——盖斯凯尔夫人如何描写哈沃斯村》在时间上相隔大约十五年，但其间大约有五年到六年的时间，我的学术兴趣漂移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将“旧文”原封不动地收入论文集，对作者个人或许有“学术史”意义，但对读者却不公正，读者没有任何义务对作者个人的“心智成长史”感兴趣。我原本想趁这次结集的机会，对这些错漏百出的旧文进行一次大改，但发现大改相当于重写，而重写既不可能，也无意义：我早已淡忘其中一些旧文最初写作时的“问题意识”和特定语境，即已失去最初写作它们时的那种灵感和激情，其情形，类似于一位作家在创作了一部小说之后原稿突然丢失，他借助回忆是不可能将它复原的——那相当于用一张很厚的半透明纸来描摹下面模模糊糊衬透过来的一幅画。最终，我所能做的，只是为其中若干旧文增添部分史料以及论述，并删去一些明显的错谬。我祈祷随年龄而来的智慧是一种自我怀疑的智慧，并因此而有一种时刻如履薄冰的警觉。

给本论文集取名“文学的政治底稿”，并不意味着作者视文学为一种政治用具，而是文学自身即为某种“政治史文献”或者说“社会史文献”。这里所谓“政治”不局限于狭隘的党派政治，举凡一切有关“权力”——各种各样的权力，乃至“微权力”——的博弈过程，均可称为“政治”。这丝毫不减损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而且“文学性”的磨砺还有助于政治敏感性的磨砺，但假若我们只是沿着“文学性”的方向探求，把“文学性”非历史化，就一定会从某个时刻起陷入某种有关

文学的空洞的“玄学”。章学诚谓“六经皆史”，即还经于史或寓史于经，其向上一路，则如永州张京华君所言，为“寓经于史”。

“文学性”必须相对于一个特定“历史语境”才可被辨识或“建构”出来，它被建构的过程就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复杂博弈——各种阶级的、性别的、种族的乃至国际的力量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而它不久又可能被同处文化权力场的其他竞争力量所颠覆，另一种有关“文学性”的标准得以确立。套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的批评，“文学的本质”或者所谓“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同样也不是单个作品“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学研究，哪怕是当代文学研究，也一定是历史研究。我们时时刻刻生活在纠结的历史中，而不是生活在空洞的时间中。

历史化，并不是一种特定的方法，而是一种意识：时刻意识到每个文学文本在复杂的社会—历史的关系中经历自己的命运，同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也是历史地构成的。当克罗齐在1917年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时，他并不是哀叹历史写作的相对主义，而是指出当代意识对于历史关系的重构。

本论文集应北京大学张辉教授之约而成书。其中若干论文，笔者本人没有保存，幸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张锦女士和北京大学车致新先生的帮助，提供电子版。在此一并致谢。

# 目 录

---

自序	1
纨绔子的两重性	
——析艾伦·摩尔斯《纨绔子》，兼谈反资产阶级意识的起源	1
伦敦蝴蝶与帝国鹰	
——从达西到罗彻斯特	31
反浪漫主义	
——盖斯凯尔夫人如何描写哈沃斯村	70
清教徒的想象力与 1692 年塞勒姆巫术恐慌	
——霍桑的《小布朗先生》	119
《汤姆叔叔的小屋》与南北方问题	
——霍尔顿与脏话的政治学	146
私酒贩子与绅士	
——了不起的盖茨比	178
文学：否定性之源	
——马尔库塞论“社会主义的生物学基础”	245
——评《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	264

马克思的幽灵

——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273

“热心的少数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史前史

——评《重返伯明翰》

292

# 纨绔子的两重性

## ——析艾伦·摩尔斯《纨绔子》，兼谈反资产阶级意识的起源

19世纪前三十年伦敦的“纨绔子们”(Dandies)<sup>①</sup>是见斥于皇皇正史的一类时髦人物，即便在他们活着并在自己的崇拜者们那里颇为风光的时代，他们也遭到许多人嘲弄，他们的形象常常出现在当时一些讽刺漫画和幽默短剧中，似乎只是一些除了讲究衣着和风度之外对别的大小事务一概漠不关心的时尚家。例如伦敦出版的《欧洲杂志》在1819年1月登出一篇剧评，谈到上一年12月上演的一出讽刺哑剧《纨绔子俱乐部，或1818年》，并详细描写了该剧开场时的舞台布置：

开场，是一间纨绔子穿衣间，有一位纨绔子裁缝、一位纨绔子鞋匠和一位纨绔子胸衣制造商，他们正照着据称是艺术的原则伺候着几个剧中纨绔子穿戴，一边合唱着“Dandy O!”这首曲子。<sup>②</sup>

讽刺归讽刺，而现实中的纨绔子看起来也确乎如此。因此，他们就别指望在那些以“重大事件”——战争、殖民、科技发明、政治的纵横捭阖、经济扩张等——为志业的严肃历史学家那里获得青睐：左派史学家不大信得过他们，因为他们虽然对捣毁机器的诺丁汉纺织工人有着相当的同情，甚至在议会发言中为之慷慨陈情，也对资产阶级说

① Dandy：纨绔子，又译浪荡子。

② “Theatrical Journal,” in *The European Magazine*, January, 1819, London: Printed for James Asperne, p. 48.

过许多冷峻机智的讥讽话，但似乎也仅满足于说同情话和讥讽话，而他们自己风度翩翩的身影中却缺乏一种阶级身份明晰性，脸上也老是挂着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淡神情；右派史学家则相当厌恶他们，因为他们缺乏一种所谓的“道德严肃性”，自己游手好闲，却嘲讽那些在账房和店铺里埋头工作的资产阶级粗俗、没有文化，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们去勾引资产阶级家庭的有姿色的太太和小姐，例如 1825 年伦敦出版的《伦敦舞台》（第三卷）刊出喜剧家 W. T · 蒙克里夫创作的二幕歌剧《齐奥瓦尼在伦敦》，第二幕第二场有一段合唱“Hey randy dandy, O！”（嘿，好色的纨绔子，噢），其中两句歌词是：

他与步子轻快的好色纨绔子，噢，  
来这儿与有夫之妇玩恋爱。<sup>①</sup>

不过，诱骗女人之事，为多数伦敦纨绔子所不为，他们太关注自己的身体，以致不太关注女人。比在风月场上追逐女人，他们更愿意待在其成员几乎为清一色单身汉的贵族俱乐部，而且他们可能对把自己的最上一粒漂亮的纽扣钉在衣服的那个高度更感兴趣——英国女人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学会得体地修饰自己的衣着打扮和言行举止，最早引领英国女装时髦的时装设计师查尔斯 · 沃斯在时髦男装设计师布鲁梅尔风靡伦敦上流社会的日子里还没有出生，而“伟大的露西尔”即梅森 · 露西尔——也即在 1912 年 4 月 12 日“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与丈夫一起获救的杜夫 · 戈登男爵夫人——则迟至 1900 年才在伦敦开了一家小小的女装商店。英国人的“manhood”（男子气质）的塑造要早于“womanhood”（女子气质）。19 世纪上半叶的伦敦在发明“manhood”，而同时代的巴黎在发明“womanhood”，实际上，英国最早的女装设计师往往是在巴黎开始其职业生涯的，至于时髦男装，则以伦敦为其中心。不能否认，伦敦纨绔子有着一种异乎寻

---

<sup>①</sup> W. T. Moncrieff, "Giovanni in London, or The Libertine Reclaimed," in *The London Stage*, vol. III, London: 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s, 1825, p. 9.

常的激情,但这种激情是“投向自己的”,而不是“投向他人的”,这使他们看上去总是一副冷淡的、厌倦的、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情。他们有光,但没有热。

另外,身体的接触在伦敦纨绔子看来是对尊严的一种冒犯。18世纪的贵族可能会因喝醉酒而扭打在一起,或在与女人交往时趁机摸摸她的屁股,但纨绔子为上流社会男子的行为举止确立了一种严格的节制标准,连握一下手都应该避免:当被介绍给另一个人时,适度朝他点一点头、曲一曲身体,被认为是优雅风度的体现。你若是热情似火地一把抓住对方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而且持久地握在手中,那会被认为是粗野的、无礼的,“过于热情的”,不能被接受的,是会产生身体反感的。伦敦纨绔子的“男子气质”意味着你必须对自己的一言一行加以最大限度的控制,因为一言一行之于高雅的等级都在“修养手册”上被严格编码。

不管怎样,在当代对资产阶级史研究的大部头著作中,无论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资产阶级三部曲”,还是皮特·盖伊五卷本的《资产阶级经历》,抑或是类似爱德华·傅克斯这样的以欧洲风化史为题材的史家,都或多或少忽略了他们的存在,或至少没有将他们作为一个与资产阶级史相始终并给资产阶级文化留下深刻印迹的社会群体(这对爱德华·傅克斯的“风化史”系列来说,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遗漏)。尽管作为单个人物,他们早就分别出现在了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服装史中并在那里分别享有大名,乃至一直被供奉在那里大大小小的“神龛”中——诸如拜伦勋爵之于文学史、威灵顿公爵之于政治史、布鲁梅尔之于服装史等——但他们并不以“纨绔子”这重身份出现,因为那显得过于花哨浅薄。不过,20世纪60年代西方“反文化”运动之后,正如其他许多在历史上被遮蔽但渐渐开始浮出地表的人物群像一样,纨绔子们在新兴的“文化史”或者说“新文化史”中找到了自己的深刻的角色表达,并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孤单的历史群体,而是有着自己一连串的精神后裔,哪怕其衣着破烂得看不出这种继承关系:刻意将自己打扮成破衣烂衫,正如刻意把自己打扮得精致

得体，都是拿自己的身体作为一种反叛象征，其中自有一种脱离身体本身的“形而上学”。用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国理论家布迪厄的说法，他们使美学“趣味”（例如服装）成为一种阶级“区隔”的手段，成为一种获取社会优越感的“象征资本”。在资产阶级越来越占据更多的个人财富时，渐渐在经济上不敌资产阶级的贵族开始将“趣味”作为一种区分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最高指标，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是体现于其“积累”，而是体现于其“高雅的消费方式”。桑巴特和梵·布伦分别在《奢侈与资本主义》和《有闲阶级论》中揭示了一种“炫耀性消费”，但奢侈的炫耀主要见于 18 世纪的贵族和 19 世纪的“新贵”，至于 19 世纪初的伦敦“纨绔子”，则追求一种“低调”——他们的“节制”原则显现于他们的衣着、谈吐和举止，他们以“低调”来区隔于他人。

实际上，尽管 1837 年登基的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着手从英国宫廷中清除纨绔子作风，为清教主义的资产阶级工作伦理正了名，但并没有终结“纨绔子精神”，它不断还魂于一些对资产阶级充满美学和道德的反感的小群体身上。我们可以在后来的历史中找到他们在外表和气质上各个不同的精神后裔，如稍后出现在巴黎的浪荡子（如波德莱尔）、19 世纪末期伦敦奇装异服的颓废的唯美派（如王尔德）、20 世纪初栖息于欧美大城市穷艺术家村落的波希米亚人、20 世纪 60 年代穿破烂牛仔裤的嬉皮士（如金斯堡），而在 70 年代一身高档休闲服装的雅皮士开始登场亮相，之后又出现了融布尔乔亚与波西米亚这两种在历史上通常合不来的形象于一体的“布波族”。

发端于伦敦纨绔子的反资产阶级情绪在经历浪荡子、波希米亚人、唯美派和嬉皮士一波接一波的涨落之后，最后深深落进了资产阶级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之中，其最初的反叛精神蜕变成了一种自鸣得意。资本主义的整合效应不仅使工人阶级失去了阶级意识，还掏空了自纨绔子到浪荡子、波希米亚人、唯美派一直到嬉皮士的反资产阶级情感。如果说“阶级意识”以及“反资产阶级情感”形成于一种特定的文化方式，那么在中产阶级文化成为一种“全民文化”并且似

乎完全遮蔽了其他历史可能性前景的时刻，那些与之相异的“阶级意识”或者“反资产阶级情感”就只能附着于一些零星的怀旧的个人，不再以社会思潮或者社会运动的形式出现。为了把自己从现代消费社会制造的一致化和标准化中拯救出来，那些不甘心沉沦于“众人”的人以更狂热的劲头追求“个性”，但恰恰是“个性”瓦解了群体的或阶级的意识和特征。

反资产阶级意识或情感，最初不是形成于工人阶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破衣烂衫的工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而是形成于伦敦衣着高雅的贵族纨绔子弟们，而且，正是这个看起来主要以奢侈消费为特征的贵族化团体对破衣烂衫的工人提供了最初的道义支持，而在作为他们精神后裔的巴黎浪荡子那里，这种道义支持还转变为在街垒后面与无产阶级并肩战斗。不过，在 1968 年 5 月的巴黎，当街垒模仿巴黎公社的方式重新构建起来时，街垒后面只剩下了嬉皮士——那些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并且正在著名大学读书的孩子们，他们似乎成了反叛资产阶级的唯一群体。

马克思在 185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说过的一段非常著名的话，被认为是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高度概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sup>①</sup>尽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因其“经济决定论”色彩而在后来受到置疑，但经济状况即使不是决定因素，也构成一个基础因素，例如即便资产阶级的一些成员——浪漫主义的资产阶级妇女和“波西米亚”的资产阶级青年——受到非资产阶级和反资产阶级的文化的诱惑而反叛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不会作为一个阶级整体来反叛自身。只有在社会的经济状况出现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中所说的那种“普遍富裕”的情况，阶级的区分意识才会淡化，而“丰裕社会”中

---

<sup>①</sup>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82 页。

阶级意识的淡化也恰好证明经济状况对于意识的影响。此时，左派或者说“新左派”只有在大学才能找到自己的栖身之所，他们在那梦想着一个失去的时代对于社会公正的政治热情：有些在无休止的梦中亢奋得发了疯，更多的则在人群中测量着自己失败的深度。

不过，如果把当今资产阶级最终对发端于 19 世纪初伦敦纨绔子的那种反资产阶级情绪的接纳归因于资本主义体制如今已具备了一副可以容纳一切杂七杂八的东西乃至其对立物的好胃，那么，我们对资产阶级的理解或许依然停留在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里对“资本主义企业家和现代主义艺术家”这两种对立驱动力的经典解释，而贝尔的解释不过以当代的术语复述了伦敦纨绔子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对中产阶级和绅士所作的阶级区分。显然，这无法解释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资产阶级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多种形态以及多种形态的混合。

这种解释困境，与“资产阶级”的定义有关，即认为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具有狂热的不断越界的冒险精神而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却因循守旧、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具有精神分裂症状的阶级。下这个经典定义的人，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对资产阶级心怀不满的那些阶级。他们趁资产阶级刚在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站稳脚跟的时候，就迅速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使其“不能再现自己，而只能被再现”（套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评述法国农民的话）。

但资产阶级之所以患上这种精神分裂症，原因在于它的部分人格不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它才会在文化、艺术、道德、生活方式等方面表现出非现代主义的特征，并将纨绔子、浪荡子、波希米亚人、嬉皮士等典型体现着现代主义精神的人视为危害资本主义体制的不安分因素。但后一类人又何尝不处在精神分裂的心理状态中：他们一方面谴责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不断越界的冒险；另一方面，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他们又像资产阶级一样不断越界和冒险，去穷尽各种可能性，以至于导致“可能性”的枯竭。在“历史终结”的预感下，历史想象力贫乏得像

是从一只早已几乎挤干的柠檬中勉强挤出几滴残留物来。

资产阶级残缺的那部分资产阶级人格，恰恰出现在这些反资产阶级的人物身上。换言之，资产阶级并没有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体现资产阶级的真正精神。当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不断越界的时候，这些反资产阶级的人物也以相同的方式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不断越界。他们彼此视若仇敌，使他们看不清原来对方正是自己的另一半，甚至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还以街垒的方式来证明他们之间的势不两立。但 60 年代反文化运动与其说摧毁了资产阶级文化和生活方式，不如说摧毁了资产阶级从旧制度中继承下来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将真正的资产阶级精神带进了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在 60 年代运动偃旗息鼓后，我们看到的不是旧文化和旧生活方式的回归，而是以不断越界、不断试验、不断翻新为特征的现代主义文化（或“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流行，它和“后”现代社会正好合拍——之所以在“后”（post-）这个前缀上添上一个引号，是为了说明后现代主义只是现代主义的当今形态，而现代主义是一条贯穿于现代资产阶级史的漫长脉络，只不过到了 60 年代以后，它才从另册进入正册，从反叛者变为解放者。它解放一切，并宣布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保持价值中立，视价值评判为变相的专制主义。它成了政治民主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对应物。当我们沿着这条线索回溯到 19 世纪初伦敦的纨绔子那里时，我们却发现一种与民主精神格格不入的贵族排外主义。

纨绔子或浪荡子是反资产阶级的，他们以自己在言谈、服装、艺术、行为和生活方式上的惊世骇俗来抵制和羞辱资产阶级的平庸。但安于平庸绝不是资产阶级的本性，他们在经济和技术上的不断越界的狂热追求，使他们成为一个极不安分的阶级。奇怪的是，自 1800 年之后大约一个半世纪里，这个不安分的阶级却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对已被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打败了的贵族阶级亦步亦趋，反倒是那些十分瞧不起资产阶级的平庸作风的贵族或文化贵族比资产阶级自己更能体现资产阶级的那种不断越界、颠覆传统、追求新奇的精

神。当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平庸极尽嘲笑之能事时，他们其实将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冒险精神带进了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他们以这种地道的资产阶级精神替不自信的资产阶级摧毁了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种种传统壁垒，以至——若站在“后现代”的门槛上——回头一看，竟要将这些反资产阶级的人物当作资产阶级文化的真正先驱。

这当然不是他们的初衷。他们原本是想以言谈、服装、艺术、行为和生活方式上的惊世骇俗从美学上贬低资产阶级，为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失利报一箭之仇。正因如此，他们往往在政治上认同于社会的下层以及工人阶级，尽管后者对资产阶级所持的不是一种美学愤怒，而是一种道德愤怒。这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是一种松散的临时的结合，暂时联合起来对付那个像楔子一样突如其来地插进上层与下层这两个传统社会等级之间的“中间阶级”(middle class)。

这两个阶级分别从美学和道德上成功地将中产阶级(资产阶级)描绘成了一个庸俗粗鲁、斤斤计较、唯利是图、腐化堕落的群体形象，并且在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也就是在中产阶级日益壮大并且成为民主制度的庞大群众基础的那一段时间，使这一幅漫画深入人心，连中产阶级自己都将它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接受下来。20世纪60年代席卷整个西方的中产阶级青年反文化运动直接承袭了这一个半世纪以来贵族和工人阶级理论家对资产阶级的美学愤怒和道德愤怒，对资产阶级所继承的那种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发起了场大规模的侵袭战。他们以“波希米亚人”自居，这个形象恰好是下层阶级的道德优越感和浪荡子的美学优越感的综合。但街垒战的硝烟散去后，人们却发现，一个半世纪以来由无数有名或无名的作者群体描绘出来的资产阶级漫画突然消失了，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引领着时尚而且决无内疚感的新中产阶级形象。到此为止，资产阶级才成为自己时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创造者和引领者。如果说19世纪的纨绔子弟和浪荡子是反资产阶级的，那么，纨绔子弟和浪荡子如今却成了中产阶级的标准形象，而这一形象当初所包含的批判能